

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40年
研究丛书



上海改革开放40年 大事研究

周振华 洪民荣 主编

卷八·社会进步

徐中振 等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大事研究

卷八·社会进步

徐中振 等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大事研究.卷八,社会进步/徐中振等著.—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432-2898-6

I. ①上… II. ①徐… III. ①改革开放-成就-上海
②社会发展-研究-上海 IV. ①D619.51 ②D6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0911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郑竹青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上海改革开放 40 年大事研究

卷八·社会进步

徐中振 彭勃 等著

出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75

插页 3

字数 202,000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898-6/F·1142

定价 66.00 元

卷八·社会进步

课 题 组 组 长 徐中振 彭 勃

课题组副组长 陈 亮 张虎祥

课 题 组 成 员 叶月萍 何海兵 李佳佳

卢 垚 许峥嵘

前 言

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发端最为显著和突出的城市，在现代工商文明的熏陶与浸润之中，市民主体和民间社会逐步成长起来，并且积累了丰富厚实的底蕴。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上海伴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执着追求，努力传承和激发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探索与创新了社会发展的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系统经验与多样化路径。在社会生活的丰富拓展、社会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多元人口结构的社会融合、社区治理的开拓创新、公益组织的培育发展、社会福利的持续增长、公共文化的繁荣昌盛、社会公共政策的不断完善等社会进步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先导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和开拓引领价值的实践成就。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从经济转型、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深刻背景下考量上海 40 年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可以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把握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和重大成效：

一是在市民（新市民）个体性生存发展方面的显著变化。人们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社区人的过程，建立起新型的熟人关系，形成了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城市的成员从户籍人口发展到常住人口（包括外籍人士）的扩容，体现出开放性、包容性与融合性的内涵张力。市民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经历，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激发了社会参与的动力和活力。上海通过推进社区自治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成长、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等，呈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趋势。

二是在社会结构和体制完善方面的显著变化。伴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出现，上海注重了形成竞争性、协调性与合作性的新体制、新格局。伴随着阶层多元化的出现，上海围绕培育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参与，促进了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伴随着文化多样化的出现，上海注重了从草根社群文化到城市经典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40 年来，上海不断创新完善的社会体制，比较有效地整合了不同利益主体、不同阶层群体和不同文化样式的多样化需求与共同性追求。

三是在社会治理和参与机制方面的显著变化。上海经历的以政府为

主的行政化管理到政府、社会、市民共同参与的城市治理过程，不仅体现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与三大领域的均衡发展，而且比较切实地推进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全面深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领域不断扩大、资金投入增加，尤其是全面推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建立和发展，积极培育了社会协同的多元化主体，激发了微观社会组织的成长与活力。通过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普遍开展社区公益基金会的举措，广大居民成为项目化运作的主体，有力促进了公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是在社会参与路径和生活方式方面的显著变化。市场化与社会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趋向。今天的上海这座城市，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企业家和员工们服务社会、增进福利的热情不断高涨；通过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人们参与社会的渠道与方式丰富多样；通过车友会、业委会、文体团队等广泛的社群活动，大量志趣性、互益性初级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上海世博志愿服务活动能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有助于建构一种非亲情、非熟人的新型社会互助与社会公益关系；有助于拓展一种新型的社会参与途径与社会行动的组织方式；有助于培育一种新的社会公共精神，在关注公共生活和担负起公共责任的同时，获得社会价值的实现以及个体的全面发展。

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和改革发展路径，需要深刻把握三大基本关系格局及其特征。一是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格局：从再造市场走向重构社会，市场分化在先，社会整合滞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单位体制走向社会领域。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格局：中国的改革战

略与发展原则体现出从政策调整型走向制度安排型的路径特征，从利益平衡走向权利平等，从政府推动走向社会共治。三是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格局：从党政一元化、行政一体化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党的新格局，强政党既体现在与行政权力的结合方面，又必须体现在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的融合方面。

以这样的视野和立意分析判断 40 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首先是以市场效率为取向的改革，这个取向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围绕利益和效率，通过个体与组织的利益追求激发了市场的活力，而且基本的手段与方式是通过政府制定出台各项政策的调节，比如开放特区，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所谓政府主导的政策调整型改革，虽然伴随着利益分化与阶层分化，但是获得了市场的活力与经济的增长。大约到了 2000 年之后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基本解决了私人物品的提供机制后，“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突出，即面临新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就不是简单的政策性的利益调整问题，其根本基础和基本原则必须是以权利为保障，必须体现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这样的改革应该注重结构完善与制度安排。我们这样分析把握改革开放的不同发展阶段有助于清醒地认识到，在市场体制改革带来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各类群体和阶层达成改革共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加强加快社会领域的改革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通过社会领域的改革，通过和谐社会建设与完善社会治理，确立权利平等和公平的价值取向，通过制度的安排来获得民众福祉与社会进步的改革合法性认同。

从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脉络和战略定位考察，

作为现代国家的发展战略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和基本内容。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加确立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其余三项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优先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任务。2011年2月中央召开省部级领导社会管理创新研讨班，提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目标，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体目标，成为从行政化“管理”转化为社会化“治理”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历史变迁中，“社会”主要不是靠自发性和自主性发育起来的，这个过程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可以描述为人们被动地从传统单位体制中剥离出来后返回“社会”，即我们通常说的从单位人到社

会人的现象；二是可以描述为人们在突破行政管理体制分割和身份限制，通过大规模、大范围城乡流动后出现的“社会盲目流动”现象（城市内部则表现为人户分离现象）。因此，从结构性、主体性、功能性等方面的要求考察社会存在，体现出当前中国的“社会领域”主要是被剥离出来的和流动出来的，“社会领域”客观上是非系统性和非体制性的存在。同时，我国的“社会存在”表达为“显性力量”的方式和形态也是比较独特的，通常体现为社会问题与压力风险，如群体冲突、集体上访等；网络舆论的随机性聚焦的影响；业主委员会、车友会等的自发性活动等。因此，我们通常比较多和比较强烈地感受到的是消极的社会现象和冲突的社会矛盾。

在社会研究的经典理论阐述中，主要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使用过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大领域的分析意义，即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黑格尔认为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前者代表公共利益，后者是私人利益系统，因此黑格尔曾被认为是为普鲁士王国辩护的反动保守的思想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分析市民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人的本质被异化，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分析思想，形成了剩余价值学说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成为人类进步的价值目标。当代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分析中，逐渐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结构性领域的理论框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是提高执政能力，即运作国家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的能力；二是提高领导能力，即主导社会领域和凝聚社会公众的能力。在这样的政党现代化战略中，积极努力地注重培育“活跃的社会细

胞”和“积极的社会要素”，形成党的建设的组织资源、社会基础和丰富土壤，深刻把握了执政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发展趋势，努力使社会资源成为执政资源、执政要素和执政基础。

本书的叙事方式和逻辑是追求历史过程与重大主题的结合。人们走出单位体制后回归与重建日常生活世界。人们摆脱行政分割体制后开始广泛的个体与群体的市场化、社会化流动。随之而来的是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体现的社会功能的形成与拓展。并且必然出现人们在慈善、公益和志愿服务领域的广泛的社会集体行动和社会参与机制。我们试图围绕这样的历史过程与重大主题来阐发“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因为不仅仅是通过人们物质与文化生活的改善，而且必须要在社会功能的发育拓展中，在新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的成长完善中，才能比较深刻和全面地体现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主题。

目 录

第 1 章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	1
1.1	走出单位、重返社会	3
1.2	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	15
1.3	社会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25
第 2 章	人口变迁与社会融合	52
2.1	城市户籍人口增长与老龄化挑战	52
2.2	流动人口剧增与新上海人的城市吸纳	62
2.3	人口分布的空间结构逐渐优化	78
第 3 章	居民自治与社会共治	92
3.1	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	92
3.2	居民区自治的探索	111
3.3	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	116
第 4 章	培育社会组织与社会协同发展	126
4.1	草根社群的成长与活力	128

4.2	公益服务组织发展与社会功能拓展	132
4.3	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的新格局	144
4.4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151
4.5	总结	155
第 5 章	公益慈善志愿服务活动的兴起	163
5.1	组织志愿服务与培育社会认同	164
5.2	公益活动广泛开展与促进社会参与	181
5.3	发展慈善事业与彰显社会道义	194
5.4	发展社会契约与培育社会诚信	205
第 6 章	社会结构转型与功能机制完善	227
6.1	上海社会发展的四个显著变化	227
6.2	上海社会发展进步的四个领域	238
6.3	总结与展望：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248
	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68

第 1 章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 协调发展

中国近 40 年的现代化进程呈现为一个多层面、多样化的社会变迁过程。随着旧体制逐渐被消解，在原先政府行政一体化的领域之外，逐渐发育和发展了新的市场经济领域，以及更为广泛复杂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是不可逆转的新趋势和新格局。^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新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社会发生了一场重要讨论。当时围绕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针对一些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道路，提出了著名的“有增长而无进步”的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增强国力，普遍采用了以经济增长尤其是以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优先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观认为，随

^① 李友梅、徐中振、陆铭：《市场 社会 政府：共和国 60 年发展理论解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着经济的增长，自然会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进步。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这种经济增长遮蔽社会发展的发展战略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分化悬殊，并且把就业、保障、福利、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与进步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最终频繁地出现了军人政变、政局动荡的现象，由此形成了“有增长而无进步”的局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增长第一”的传统发展观受到广泛批评，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观受到普遍重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扭转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先生产后生活”“重积累轻消费”的发展格局，代之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然而应当看到，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的时候，以经济发展简单涵盖社会发展、以物质生活建设片面遮蔽社会生活发展的观念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纠正，市场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发展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机协调和相互促进的格局。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经济增长迅速而社会发展滞后的态势，自然环境、人文资源、社会生态往往遭到了较严重破坏。^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逐步形成和提出“发展 = 社会 + 人”的新理念，重视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发展根本上应注重促进人的素质提高和潜能的发挥，把改善和提高全体民众的生存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②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注重发展和谐的社会和健全的个人。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确立社会公平、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理念，必须以普遍主义的立场建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

① 杨建华：《发展社会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②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从公民基本权利的意义上理解和发展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必须在放权、分权、平权的基础上切实培育功能性的民间组织和自治团体。因此，作为健全的个人不仅仅是纳税人，不仅仅是市场消费者，应该注重培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公民主体，应该引导个人融入社会，学习合作协商的民主精神，应该鼓励个人参与社群活动，培育互助团结的共同体成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代中国的深刻变迁中，社会的发育和发展，社会资源的集聚和社会权威的确立，社会组织和网络的形成与扩展，都将是一个不可遏制和逆转的社会进步的大趋势。

1.1 走出单位、重返社会

经历了近 40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性领域已经基本确立起来。市场经济制度的再造也奠定了社会发育与社会重构的历史前提和强大动因。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结构性分化，单位体制的消解促进了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这些进程必然导致社会事务大量涌现、重新分解并逐渐回归社会。二是在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许多政府行政职能无法涵盖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出现许多行政化方式不适合处置的公共事务和民间需求，这些变化奠定了民间社会自治发展的客观基础。三是伴随着人们与职业谋生组织依赖关系的简化和弱化，大量“单位人”“经济人”蜕变为孤立的“自然人”角色，他们需要重建新的社会联系和关系，通过社会参与和互动，逐步获得“社会人”的特质。

从社会层面分析，积极的组织化的个体参与和互动构成了社会支持系统的微观结构。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压缩了人们所有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关系。今天，单位组织之外的社会空间正在不断扩展，人们通过参加球迷俱乐部、业主委员会、消费团购网络等获得了新的社会角色，发展了新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随着社区建设、居民自治的发展，人们在基层社会的参与和互动不断增强。我们在社区活动中已经能够看到丰富多彩的合唱队、拳操队、书画和戏曲协会等大量新兴的旨趣性、自治性组织，人们自愿结合，自主参与，并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互动方式。

1.1.1 单位体制与社会空间——“韩琨事件”（星期日工程师）

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上海站记者谢军报道韩琨事件的文章《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报道发表次日，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法学权威徐盼秋约见了谢军。1983年1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徐盼秋的文章《要划清是非功罪的界限》，当天还刊登了韩琨辩护律师郭学诚的文章《法律应保护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之后，表达观点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往光明日报社和上海记者站。《光明日报》决定就此事展开讨论，连续刊登了各种观点的读者来信。适逢中国科协咨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报纸的讨论又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反响。

专栏 1.1 韩琨“无罪” 第二职业从此合法化

“韩琨事件”是二十多年前发生在上海奉贤的一起案件。1979年，奉贤县钱桥公社橡胶厂决定聘请橡胶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帮助企业走出